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罗选民



20世纪 中国文学论稿

钟友循 著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20世纪中国文学论稿

责任编辑:岑杰

装帧设计:丁明

《沈宝基译诗译文选》

《沈宝基诗集》

《阐释与解构—翻译研究文集》

《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

《形式与功能—语言研究文集》

《法汉翻译文集》

《对话—文化视野中的文学》

《论科技英语与科技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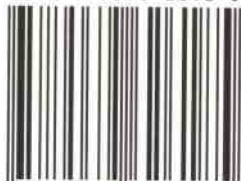
《法语学习的障碍与对策》

《20世纪中国文学论稿》

《美国性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

《英汉文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

ISBN 7-5396-2618-6



9 787539 626185 >

ISBN 7-5396-2618-6

定价: 20.00元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20世纪 中国文学论稿

钟友循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文学论稿/钟友循著.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11

ISBN 7-5396-2618-6

I. 2... II. 钟... III. 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4348号

20世纪中国文学论稿

钟友循 著

责任编辑:岑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

字 数:250,000

印 数:1000

版 次: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618-6

定 价:2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作者的第二本学术论文专集，收入作者多年来对当代军旅诗派、归来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及艾青、穆旦、绿原、北岛和后期自由诗派，杨朔、余光中及朱正、钟叔河、李元洛等中国现当代散文名家，周立波、唐浩明、姜贻斌、阎真等湖南小说名家，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的研究论文多篇，视野开阔，思想活跃，颇多独见，文风畅达。其历史与现实观照、文化与社会关怀、人文精神与学术理性、微观解读与宏观把握相统一，不失为值得一阅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参考性读本。

丛书主编简介：

罗选民，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话语分析、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英国伦敦大学 (SOAS & UCL) 亚非文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加拿大麦吉尔 (McGill) 大学《翻译学刊》(TTR) 国际顾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顾问编委、《中国翻译》编委。著译有《话语分析的英汉语比较研究》、《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等十余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翻译》、*META*, *Tamkang Review*,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作者简介：

钟友循，1950年4月生，湖南省衡阳市人，北京大学文学士 (1982)、文学硕士 (1984)，教授 (1996)，全国优秀教师 (1993)，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1996)，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三等奖获得者 (1996)，湖南省普通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 (1998)，华中电力开发公司奖教金一等奖获得者 (1999)，湖南省首届“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 (2000)；已出版中国当代小说史、现代散文史、新诗研究、影视研究、现代写作研究、演讲与口才等著作15部；发表文学、影视、戏剧学术论文100多篇，主编丛书1套，参编著作2部，发表论文、随笔、散文、杂文等500多篇；出版个人学术论文专集2部。现为中南大学文学学院副院长。

安徽省“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顾 问：刘重德 吴元迈

主 编：罗选民

副主编：萧立明 余协斌 屠国元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王友轩 | 田德蓓 | 何云波 | 刘有元 |
| 伍雅清 | 余协斌 | 杨寿康 | 罗选民 |
| 张森宽 | 张跃军 | 钟友循 | 萧立明 |
| 屠国元 | 韩景泉 | | |

目 录

| | | |
|--------------------|-----------|-----|
| 农民命运 | 时代主调:自由诗派 | 1 |
| 琴瑟和鸣 | 笙箫流韵:军旅诗派 | 23 |
| 炼狱悲歌 | 灵魂战叫:归来诗派 | 35 |
| 血火交迸 | 凌厉高蹈:七月诗派 | 45 |
| 独特情志 | 别样芬芳:九叶诗派 | 56 |
| 艾青论 | | 68 |
| 穆旦论 | | 80 |
| 绿原论 | | 93 |
| 北岛论 | | 106 |
| 中国当代学者散文的艺术特色 | | 119 |
| 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历史地位 | | 130 |
| 论朱正、钟叔河散文的地域风貌 | | 141 |
| 论李元洛学术散文的文本特质 | | 153 |
| 论王蒙'95文化随笔的文体特征 | | 164 |
| 中国当代抒情小说的艺术发展 | | 177 |
| 高晓声论 | | 186 |
| 周立波论 | | 197 |
| 姜贻斌论(一) | | 208 |
| 姜贻斌论(二) | | 221 |
| 湖湘文化与湖南文艺:昨天·今天·明天 | | 234 |
| 文学的缺失 还是文化的缺失 | | 248 |
| 生存的匮乏 还是生命的匮乏 | | 261 |
| 论新时期湖南小说的乡土情结(一) | | 272 |

| | |
|-----------------------|-----|
| 论新时期湖南小说的乡土情结(二)····· | 283 |
| 《沧浪之水》与当代湖湘文化····· | 299 |
| 《沧浪之水》与湖湘社区人格····· | 311 |
| 《沧浪之水》与湖湘地域风情····· | 323 |
| 《沧浪之水》及其接受效应····· | 335 |

农民命运 时代主调:自由诗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而在粉碎文化“围剿”中诞生了“左联”。“左联”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确立并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学艺术界的当仁不让确定无疑的领导地位。它的成立及其所开展的活动，为中国现代诗歌运动在此一阶段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文协的成立，又促进在新诗有力地继承与发扬“五四”以来我国新诗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辉成果，并推动新诗艺术的进步，而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三四十年代兴起的进步的诗歌流派，不约而同地以呼应、召唤、歌颂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调，表现出或革命、或民主、或进步的积极趋向。在艺术形式上，一方面立足于“五四”以来既有的诗歌传统，以热烈、自由、从容、挥洒地抒写自己民族、时代感情和追求革命、解放、民主、进步的健康心声为己任；一方面又服从和适应当时社会生活以及诗人自己内心主观意愿的需要，各类表现出自己不同的创作追求和艺术风貌，在对 30 年代以前的各类诗歌艺术经验有所借鉴、吸收、继承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更新、进步、发展与创造。因此，尽管从整体上看，这一时

期的诗歌创作的总体面貌,无论在思想、艺术、内容、形式等方面,都与此前的由“五四”新诗发轫而来并且日渐成熟、完备和不断地出现新的因素的诗歌传统有所不同,但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大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它们却又各以自己鲜明的个性与风格,在其内在血脉和生命上,显示出自己确是其中一个有机的、重要的和更高阶段上的组成部分。因此,既是对前者的批判与扬弃,同时又是它的完善与发展。

从形式本身来看,早期胡适、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白话诗,虽然采取了新的语言形式,但中国传统旧体诗歌的许多因素,却仍然无法不在其中留下自己一时还难以彻底根除的胎记;郭沫若的《女神》以狂放的激情和大胆的创制,不但开一代诗风,拓展出浪漫主义自由体诗歌的宏阔天地,而且在形式上为新诗的成熟与发展,开辟出一条光明灿烂的道路;在蒋光慈等的政治抒情诗,文学研究会和冰心的哲理抒情小诗,“湖畔诗社”和冯至等的爱情诗相继风靡、流行之后,新月社针对当时和其后诗歌界“自由诗”渐趋于散漫浮浅的流弊,提倡格律诗,以整饬、规范、严谨、精熟为美,又将新诗发展引入一个新的路径;李金发、冯乃超等人从异域诗歌中得到启发,汲取营养,在艺术形式与手法方面,为新诗艺术的丰富亦算是尽了一点笨路蓝缕的薄力,但这一点洒洒的微雨,却被李金发诗歌本身的生涩与艰奥所冲散,象征诗因此一诞生便进入危境。这些,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诞生、崛起、流行、繁盛于当时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大时代中的各派诗歌艺术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可以说,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的各派诗款,一方面固然是当时时代风云、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与此前诗歌有着牢固、密切的联系的特定阶段的艺术现象。

而由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所构成的后期自由诗派,便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艺术背景之下,在特殊

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之中滋生和成长起来的。

从单纯的形式意义上看，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各种主要诗歌流派的作品，绝大部分是采取了“自由体”诗歌的写作方式。之所以单称由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所构成的艺术现象为后期自由诗派，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这方面有独特的建树和巨大的影响。具体地说，第一，他们的诗歌，从孕育、诞生到在诗坛上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但因其在思想内容上有自己鲜明独特的追求与倾向，而且因为他们的诗歌如放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历史洪流中看，一开始就带有对此前诗歌“拨乱反正”的意向；第二，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歌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中国诗坛上的集中出现，一方面可以视作是中国新诗在自由诗和格律诗这两种体式之间循环往复，相互交替现象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的又一次开始，另一方面与郭沫若在其《女神》时代所开创的自由体诗歌相比，很明显地也具有了一些新质，而其与二十年以来的其他流行诗歌之大异其趣则更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即便放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环境中，他们的诗歌不但其出现和发生影响都较早，而且正因其艺术上的创制不但较为独特、醒目并有比较明显和成熟的个人风格，所以才得以传之久远并引起人们特殊的注目，惟其如此，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流派峰起、现象纷繁的诗坛上，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一种以其独特的思想、艺术建树不但在某些方面超越前人而且也毫无疑问地曾经和正在泽被后人的诗歌现象，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后期自由诗的艺术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其诗歌的创作面貌大体具有如下的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具有深刻联系。

艾青、臧克家、田间的诗歌创作活动，都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或 30 年代初，其最早的一部诗集的出版，则分别是在 1933—

1936年间。其时，正是中国工农革命处于低潮或危境之中，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地下斗争与农村武装斗争，或接近完全被扑灭，或正在进行大退却的时刻。而中、日之间的民族对抗，也即被侵略者和侵略者之间的殊死斗争虽尚未正式公开化，但日本帝国主义由侵占我国东北开始的蚕食、掠夺我国的罪恶阴谋，却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按照其既定计划进行。因此，当时由农村经济破产和部分地区沦陷所带来的农民生活均极端贫困化，以及由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下层人民的无耻盘剥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的日趋恶劣，都已经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丑恶。加之天灾、战乱等因素，使得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几乎无时无刻地不是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乎没有能够喘一口气的机会。正因为如此，艾青、臧克家、田间等由于其各自出身、经历、见闻、体验的关系，其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极为深切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艾青的《大堰河》，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田间的《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早期诗集，内中就大多都属于这种情况。

艾青的诗歌创作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在思想内容方面，首先就在于他那蕴蓄着极其深沉爱憎的，带有强烈、浓郁的忧郁与感伤的主观情感。作为一种创作特色，这种主观情感在艾青的诗作中，既是明显地外溢的，又是始终牢牢地与他所吟咏的土地、田野、乡村相联系的。从《大堰河——我的保姆》来看，在艾青当时年轻人的心灵的深处，这种以忧郁和感伤情调所表达出来的主观情感，大致上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第一，作为从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少爷”，他对与自己血脉相系的那个阶级特别是包括他的生身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实际上是怀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其中既有一定程度的厌恶，同时又不无惆怅与眷恋——这是一种出于纯粹的亲情的眷恋，这一点，在他后来的某些诗作如《我的父亲》（1941年）

中,也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但第二,作为一位贫苦农妇的“乳儿”,他因为从小就受着她亲切、精心的滋养和爱抚,吸吮着她的乳汁长大,眼见着她在艰窘的人生境况中苦苦挣扎,他内心深处真正的爱,却又是毫无疑问、毫无保留地给予了像她这样在当时中国农村中最贫苦、最勤劳、最善良、最高尚的普通农民的。因此他在自己诗歌中所作的那些对土地、对田野、对乡村的一如既往、一往情深吟咏,其根源与归宿,便都是基于这种自己内心深处从小就培养起来的最纯真、最强烈、最深切的感情。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因切身的体验而带来的与她们那种无论何时何地都驱之不去、逐之不能的精神与感情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后者那种极其悲惨、极其不幸的命运,曾无数次一再触动了他自己那善良、敏感、柔弱的心弦。正因为如此,不但他在因从事进步美术活动而入狱的日子里,由于备感孤独、清冷、寂寞,而情不自禁和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己早年生活,并力图从中寻找温暖与慰藉之时,便以深切、绵长、热烈的情愫,在纷繁的思绪与联想中,极其真实、深刻、细腻、动情地写下了表达这种感情的优美诗篇,而且这种感情的不能自抑和发幽人微的表达,在他以后漫长的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的过程中,不论是在漂泊无定的颠簸中,还是在呼唤胜利与光明所作的呐喊里,都从来未曾断过。艾青始终以最深厚的感情、最美丽的心灵、最虔诚最圣洁的祝愿、最亲切最动人的语调,在唱着这种对大堰河,对故乡的农夫,对土地、田野、乡村和小油灯的深切眷恋的歌。这些歌,尽管由于后来更多地系念祖国、民族、国家的前途和无数像大堰河一样的普通人民的命运,以及其心中所一直强烈地向往的光明与自由的人类前途等等,曾经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新的色调、新的旋律和新的节奏,但他这种如孺子依恋、爱戴自己母亲那样的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高贵感情,却从来没有丝毫地淡薄过。必须指出,艾青在自己美丽的作品中所表达的这种感情,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对普通下层劳动人民的单纯而朴素

的同情,其内在的精神核心,乃在于它是一种最伟大、最崇高、最真实、最强烈的爱的表露,内中既有感激与关切,也有钦慕与崇敬,而绝没有一丝一毫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因素。这是民族的、阶级的、革命的、进步的感情与人的亲情之一种最高度、最和谐、最完美、最充分的融合。它来自人民,又奉献给人民。因此,它又是最高尚、最神圣、最美丽和最纯净的。

臧克家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之间,也有着极其明显、深刻、突出、强烈的精神联系。但与艾青不同,他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这种精神联系,主要地不是在感情上而是在思想上。在他早期那些饱含着真情实意的诗歌作品中,对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现实状况与客观命运的如实描写之中所蕴含、所透露出来的以深切真挚的同情为表征的同他们的感情联系,虽也极其明显,但臧克家诗歌以其最重大最鲜明的特点所留给人们的更为深刻的印象,却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于他通过这种同情或关爱所表现和流露出来的处世哲学与人生态度之与中国农民的共通之处,也即他自己所明白表述的那种“个人的坚忍主义”。在这方面,其著名诗篇《老马》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诗中的“老马”形象,既是写实,又是象征。一方面,他以凝练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语极其简洁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农民以至几乎所有从漫长的中国历史生活中走来的传统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命运、遭际、精神和品格。另一方面,他在这种既洞察入微又入木三分的刻画中所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关心之外的赞美与钦敬,又说明他自己对于这种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中国农民和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劳动群众的传统品格,也有着某种思想上的认同,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精神现象,臧克家实际上都是对之抱肯定态度的。与艾青极其真诚地感激中国农民,中国人民所慷慨给予自己的无私而纯洁的爱不同,臧克家所注意、所表现、所颂扬的,主要是他们在艰厄困窘的现实处境中正视、面对、承受苦难,于险恶甚至残酷的人生遭际中,以其坚忍不拔、刚毅倔强的意志默

默地忍受生活的磨难,在“鞭影”中“抬起头望望前面”的如小草般不辞践踏、死而复生的生命强力,以及愿意在日日时时的打击与压制中,“有泪只往心里咽”,来期待有朝一日命运改变的无怨无愤、无怒无悔的韧性精神。因此,臧克家的诗歌,可以说是在与艾青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思想、精神、感情的侧面,而与中国农民同时也是与中国人民的心气与本质相通。正因为如此,作为当时诗坛上人们所称誉的“乡土诗人”,臧克家的诗歌创作的特色与贡献,不只表现在以诗歌作品来回忆农村生活,表现农民苦况,而且更表现在通过描写农村现实和农民遭际,借助对其求生意志与人生态度的挖掘与阐扬,来表明自己对此的一种心态极其鲜明的道德、伦理感情和处世、人生哲学。因此,他早期所写的大量农村题材作品,其价值就不仅在于它们已经准确、深刻地刻画出封建性的中国农村所孕育、培养出来的中国农民的悲剧性性格(其后所写的一些主要描写中国城市贫民的作品亦有类似倾向),而且在于客观上也借此反映了诗人作为一介“知识分子”在真诚地同情、关注、热爱中国农民的感情态度中,所蕴藏的与传统中国普通群众在生活哲学方面息息相通的思想特点。如果说艾青比较充分地肯定了由中国农民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人民的光辉品格,以一种热烈、执著的情志,表明了自己渴望中国农民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得到根本改变的强烈祈愿的话,那么,臧克家在这里却是以一种比较沉稳的气度,含蓄地传达了自己相信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民以自己顽强的生命意志,不但完全可以,而且也应当能够经受住人生风雨的剥蚀,渡过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命难关,等待新生活到来的潜在信念。当然,其诗歌创作立足和局囿于中国农民、中国人民现实的生存境况所表现出来的以深切的同情和关爱为核心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也可以说是极其明显的。因此他的诗歌,与艾青总是时时处处透露出热烈的情怀和坚执的向往不同,主要地也就是一种对中国农民、中国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这当然都是指他们早期的作品。

田间早期诗作的影响远不如艾青和臧克家那么大。这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中没有独特深刻的东西，其次也因为就当时的实际情形来说，它在艺术上也还不够成熟，并且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诗人自己的鲜明个性，没有与当时的时代情绪从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方面达到如后来作品那样相互间紧密的契合。因而它就既不能在思想、感情和情绪上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与触动，也不能给他们以新鲜别致的艺术印象。但尽管如此，田间这时的诗歌，仍然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中国牧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斗争，以及诗人自己对中国农民日益深切的关心。由于田间此时的诗歌，事实上已经以抗日救亡作为自己的基本母题，因而这些作品一方面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热爱农村的感情和向往农村中新鲜活跃的生命力的情绪，一方面也以较为充实的生活感受与比较明朗强烈的歌调，呼喊向着侵略者进行反抗与斗争的号召。在这些地方，无论与艾青还与臧克家相比，从主观感情的表达及对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都是很不相同的。这当然是因为这时在他的心中，已经更早地比艾青与臧克家充满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燃烧”的、“粗野”的“愤怒”的缘故。这种情绪一方面与他在这之前于《未明集》中所业已表达过的东西有某种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在他其后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中则有了更集中的表现：他一面以躁动的情绪、激烈的语言揭露和控诉地主阶级的欺压和帝国主义的屠杀所造成的农村现实和农民命运的惨状，一面满怀着理想与信念号召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去勇敢战斗。所以，这一时期田间的诗歌，对祖国的田野、森林、江河的热烈的歌唱，与对剥削阶级、侵略者的揭露、控诉与声讨，就在抗日救亡的主题意向之下被很好地统一起来。可以看出，同样是注目现实，表现农村，关怀中国农民和中国人民的遭际与命运，但田间并不像艾青和臧克家那样，强调表现那些深藏于自己内心深处使自己强烈、深切地执著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